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鄂东南民间乐班传承发展机制研究

柳冬瑕 胡丽君
(湖北师范大学)

摘要: 依托优秀的传统乡土文化实施铸魂工程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关键的一环。鄂东南民间吹打乐及乐班作为乡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了繁荣乡土文化、塑造文明乡风、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 民间乐班的“自适应”生长机制, 动态发展内动力以及重传统敢创新的传承机制, 让鄂东南民间乐班历经百余年仍活跃于广阔的乡土中。

关键词: 乡村振兴; 鄂东南; 民间乐班

鄂东南, 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幕阜山脉北麓。

鄂东南作为一个地理文化概念, 依据现今的县市行政划分涵盖了湖北的鄂州、黄石、咸宁、黄冈南部以及武汉南部。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记载流传于鄂东南的主要民间器乐种类为民间吹打乐牌子锣。鄂东南地区的牌子锣又因鄂东南各地民风民俗、社会结构、审美偏好、语言等的差异发展出鄂州牌子锣、下陆王寿牌子锣、黄州点子、竹山牌子锣、新洲牌子锣鼓等小类。从音乐风格上来说牌子锣音乐声宏亮, 节奏鲜明, 与鄂东南地域的高腔戏、地花鼓等民间音乐互为借鉴, 有较强的群众性、实用性, 较高的审美品位和历史价值。

因牌子锣的广泛流传, 牌子锣乐班在鄂东南地区非常普遍且艺人众多, “一般每个自然村有一个乐班, 大村甚至有两个, 人数 8 到 12 人不等。”¹ 在鄂东南数以百计的牌子锣乐班中亦有佼佼者, 这些乐班皆传承五代以上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以及社会影响, 例如: 鄂州陈太村牌子锣乐班、黄石王寿牌子锣乐班、武穴郑家岭丝弦锣乐班等。其中黄石王寿牌子锣乐班在鄂东南地区尤为出名, 因其作为主导申报的王寿牌子锣不仅是黄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是于 2007 年成功获批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王寿牌子锣乐班诞生于“城中村”黄石市下陆区王寿湾, 乐班的发展兼具乡村乐班与城镇乐班特色, 另外乐班在组织结构、传承方式、发展环境等多方面具有鄂东南民间乐班的普遍性, 因而本文将王寿牌子锣乐班作为鄂东南民间乐班研究的着眼点, 进而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鄂东南民间乐班成长机制

(一) 成形生长期

王寿牌子锣乐班第一代传人王全耀, 生于清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 家中世代务农, 家境衣食可保。父母笃信佛教, 加之他幼年体弱多病, 十二岁时被父母送上东方山弘化寺, 拜在中公大和尚门下当俗家弟子。中公大和尚擅长佛教音乐和牌子锣音乐。王全耀在良师的教诲下, 对牌子锣艺术潜心钻研, 二十岁时能熟读牌子锣的各种曲谱并掌握各种乐器的演奏法, 尤其擅长鼓板。他打起鼓来, 快如暴风骤雨, 慢似蜻蜓点水, 有“鼓王”之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 他将牌子锣教授给同村的同龄人, 并借此组建了王寿牌子锣乐队。这便是王寿牌子锣乐班最初的形态。

王寿牌子锣的第二代传人王忠进依据牌子锣演奏固定的乐器配置原则, 扩大了乐班的编制, 将乐班由每代一传的两套编制扩展至四套。按乐队一套编制单竿 16 人, 双竿 32 人, 以此类推, 这一时期的王寿牌子锣的乐手达到一百多人, 在只有百余户的王寿湾家家都有牌子锣乐手。

(二) 衰落裂变期

王寿牌子锣乐班发展至上世纪 60 年代, 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乐班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并且很快衰落。在当时的“四清”运动中, 王寿牌子锣被列入“四旧”, 认为牌子锣用于宗教迷信活动, 是“文化毒瘤”, 甚至第三代传人王义卿被列为“管制对象”。然而王寿牌子锣仅表面上被禁止, 器具和曲谱都被保

留下来,乐班艺人们仍会偷偷读经识谱,按耐不住时就把乐器拿出来,摆弄一阵后再收藏好。在那个年代多有人参军入伍,送新兵的时,热情的乡民们还是会想到牌子锣,新兵身穿新军装,戴着大红花,大家簇拥在一起时,牌子锣跟着吹吹打打,十分热闹。虽然这一时期的王寿牌子锣乐班的发展停滞了七八年,但实际上王寿牌子锣禁而未禁。

文革运动结束之后,民间各类民俗以及宗教活动开始复燃,牌子锣乐班的活动也渐渐的恢复。牌子锣演奏的需求扩大也促使更多的人加入牌子锣乐班,1978年王寿牌子锣乐班在停滞十年后正式教授新一批的乐班成员。第四代传人王义栋凭借自己高超的牌子锣演奏技巧带领乐班在黄石地区的迎神赛会中博得头筹,极大的扩大了乐班在黄石乃至鄂东南地区的声誉。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洋乐队的传入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王寿牌子锣乐班的生存与发展受到的双重压缩,在鄂东南地区的民俗活动中新奇的西洋乐队的加入,抢占了牌子锣的演出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王寿牌子锣乐班也尝试组织乐手学习西洋乐器并加入牌子锣演奏中,最终新的尝试失败。但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以及乡民的喜好,牌子锣乐班在各类活动中除了演奏传统曲牌以外还加入了“水调”即民间小调以及流行歌曲。

(三) 振兴发展期

进入新世纪,王寿牌子锣乐班的发展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五代传人王恒先师从王义栋学会了打钹,后来又学会了马锣、小锣,再后来学会了牌子锣的吹奏乐器与鼓,成为了牌子锣乐班里为数不多的全才。他把第五代牌子锣乐班组起来后,对牌子锣以及乐班的发展做了很多实事。王恒在继承一些传统演奏技巧的基础上,对现代牌子锣的演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首先他将小鼓改为大鼓,极大增强了牌子锣的演奏气势。其次,他废止了乐班“不吹水调”的班规,将地方小调与流行歌曲改成牌子锣曲调,扩大了牌子锣的观众群体。王恒还积极的创作牌子锣曲目,他创作的《庆丰收》多次在比赛中获奖;再次,王恒将祖传谱、乐班的无谱曲牌、新创作曲目以工尺谱的形式编订成《王氏锣谱》。最后他破除乐班“传男不传女,非王姓人不能学牌子锣”的班规,扩大乐班的传承队伍,用敏锐的眼光积极推进王寿牌子锣的“申遗”工作,最终在2007年将王寿牌子锣带上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王恒本人也被选为牌

子锣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极大拓宽了王寿牌子锣的传播道路。

借助“非遗”传承与保护的东风,王寿牌子锣乐班在2011年成立了“牌子锣传习所”。向内,2012年王寿牌子锣乐班开始招收了女性乐手;向外,王寿牌子锣乐班还受邀到其他村落教习牌子锣演奏。自2014年王寿牌子锣乐班培训外村乐班十余个,乐手达到百余人。2015年,王寿牌子锣乐班被选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基地。乐班的演出的类型也得到了扩展,王寿牌子锣乐班不仅活跃于各类民俗活动中,还被邀请参加各类晚会、非遗展演、开业活动等。

二、鄂东南民间乐班的发展动力及传承机制

(一) 鄂东南民间乐班的发展动力机制

王寿牌子锣乐班作为一支具有宗族性质的自发性组织的民间乐班,历经百年,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变革中傲然而立,这与乐班发展的动力息息相关。在乐班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发展的动力随所处社会环境亦在不断改变。以时间为轴来探讨民间乐班的发展动力机制,使民间乐班的内部运行及发展变迁一目了然,能更系统、动态的了解民间乐班的发展方向。

1、改革开放前(1898—1980)

“牌子锣是与民俗活动相依存而发展的”²,鄂东南民间的嫁娶仪程、白事葬仪、迎神赛会、贺喜祝寿都离不开牌子锣乐班。解放前,社会经济尚不发达,乡民们依靠农耕生活,牌子锣乐班主要的发展动力来源于牌子锣乐手们参加各类民俗活动能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据牌子锣传承人王恒回忆,最开始的牌子锣乐手们参加红白喜事时,只需主家提供一顿饭。之后,慢慢的在仪程中供奉的祭品在结束后会分发给乐手们。再之后,主家会象征性的给与一点报酬。这些额外的生活补给来源,在那个年代对农村家庭是尤为珍贵的。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生活步入正轨,因乡民们娱乐生活的需求,民间艺术蓬勃发展。牌子锣在鄂东南民间红极一时,牌子锣乐班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面对市场以及技艺的竞争,这时期宗族的名誉性也化为王寿牌子锣乐班的发展动力之一。彼时王寿湾全村爱锣,学锣、练锣蔚然成风,再者乐班的内部管理 with 宗族管理相融,乐班班主一般也是宗族的主事人,治下的乐班纪律严明、台风严谨,很好的保证了王寿牌子锣乐班的

市场专属性以及技艺的统一性。

2、改革开放后（1980—2006）

改革开放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王寿牌子锣乐班面临市场活跃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了演出服务市场被抢占以及牌子锣从业者数量衰退的困境。这一时期乐班的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机遇带来的盈利，从80年代初到21世纪前几年，牌子锣单个乐手参加民俗活动的报酬由最开始的2元钱上涨至50元，班主的报酬相对更高一点。日益便利的交通，乐班的演出服务区域随之扩展，乐手的收入也相应增多。同时，牌子锣乐班面临的困境以及生存压力也催化为乐班发展的另外一个动力。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眼界得以开阔，社会新事物的吸引力远大于牌子锣这种“老传统”。具体的表现为传统的民俗活动中有新兴的西洋乐队加入，乡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牌子锣的热情消退甚至产生错误的认识。当牌子锣乐班在乡村中的独有性不能保证之后，乐班的发展也只能顺势而行。于是就有了在演奏中加入西洋乐器，排演民间小调与流行歌曲的尝试。

3、文化振兴时期（2006—至今）

自2005年国家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以及普查工作，极大的推进了民间乐班的发展，开启了民间艺术的文化振兴阶段。这一阶段，王寿牌子锣乐班的研究与传播达到了最高峰，乐班发展的主动力为个人价值实现、宗族文化以及村落文化认同，乐班盈利性成为次动力，两个动力间互为支撑相互转换。王寿牌子锣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各类邀请赛、非遗展演、文艺演出占据了乐班演出活动的大部分，代表王寿村在各类比赛中获得荣誉，扩大了宗族村落以及乐班声誉也让乐班成员的个人价值得以体现。随着乐班知名度的上升，乐班在民俗活动中的报酬也相应的上涨，每场活动乐手的报酬为100—150元不等。另外，乐班整体的运营及发展资金来源也得到扩充，除了依据久规宗族的供养，另外还有乐班比赛展演的奖金、报酬以及作为非遗项目政府的资金支持。

（二）鄂东南民间乐班的传承机制

民间艺术传统的“口传心授”也是鄂东南民间乐班主要的传承方式，王寿牌子锣乐班的技艺传承首先是学唱“工尺谱”，待各个曲牌唱熟以后再学习乐器演奏。传承方式虽与其他乐班一致，但乐班的传承有自身的特色。例如固定的学习场地，2011

年在王寿湾村口建立的“王寿牌子锣传习所”是牌子锣专门的学习、练习场地；复合的学习内容，传统曲牌与“水调”穿插教学，传统曲牌用工尺谱，不管唱或者是乐器吹奏强调守传统，保留王寿牌子锣的“原味”（地域性与特色性）。“水调”用简谱教学，简化了学习过程也保留了曲目风格等。乐班传承的众多特色中最值得探讨是“一专多能”与“集中练习”。

1、“一专多能”培养模式

在王寿牌子锣乐班的传习实践中，第一阶段乐手学习工尺谱的同时学习钹、小钹、京锣、马锣、鼓五种打击乐器，但鼓作为整个乐班在演奏中的指挥者，学习难度大，需要熟练掌握各种曲牌并把握好各个曲牌之间的衔接，学习者相对较少。第二阶段乐手唱熟各个曲牌后学习吹奏乐器，要求唢呐、笛子、笙都要学，唢呐时牌子锣的主奏乐器，先学唢呐，再学后两者。运用“一专多能”的培养模式，待“出师后”乐手们至少能兼任两到三种乐器演奏，这大大方便了乐班演出时编制的集结；另外，多种乐器的学习也能促进乐手对牌子锣音乐的感悟及技巧的提升，使其在演出中与其他乐手的配合更默契与融合。

2、“集中练习”学习模式

依托牌子锣传习所，王寿牌子锣乐班建立了一套传习所规章制度，要求每周中的几天在传习所晚七点至九点进行牌子锣的集体学习与练习。无特殊原因不得缺席、请假。集中学习模式，让乐手们感到学习不是个人的事，而是集体的行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个人技艺的掌握而是为了宗族的荣誉和乐班的发展。再者，通过长久有规律的集体练习，乐手们不断去适应班社的要求与标准，在相互间学习精进的过程中，掌握每个乐手的演奏特征与习惯，这对乐班的整体演奏技艺的提升有重大作用。

三、鄂东南民间乐班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体现

（一）繁荣乡土文化

民间乐班是延续农耕文明、繁荣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引导思想观念、凝聚政治共识、推动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鄂东南的民间乐班植根于鄂东南的乡土文化中，各个乐班由于宗族、血缘、地缘以及阶层不同所蕴含的不同文化特质也塑造了各地乡土文化的特色。黄石地区乡土文化中具有代表的宗族文化、西塞神舟文化亦是王寿牌子锣的共生文化。在

村落的变迁中,村民搬出原来的村子搬到新的定居地,在定居地建造新的祠堂后,会将原来村落供奉的祖先雕像“太公”接到新的祠堂,每隔几年“太公”会在新旧村落之间的流转供奉,这便是民俗“迎太公”;新祠堂的落成,同宗的其他村落会给新祠堂送牌匾,称为“送匾”。在这些欢庆的宗族活动中牌子锣乐班的演奏不可缺席。农历五月十八黄石西塞山的长江边会举行“龙舟会”,在龙舟下水时要请多个牌子锣乐班现场演奏送行。“游龙舟”时有个规矩,必须要由最好的牌子锣乐队压阵,该殊荣多年来一直落于王寿牌子锣乐班。牌子锣虽伴生于鄂东南的各类民俗中,牌子锣乐班却让民俗中杂乱无序的乡土文化相互协调与融合,汇聚成能代表鄂东南乡村主流意识的精神文化。

(二) 塑造文明乡风

鄂东南民间乐班作为民间文化组织,本身没有文明规约的功能,民间乐班具有的宗族性在乐班的运转中建立了完善的乡村社会网络,产生社会资本,进而促进乡村稳定。向内,乐班实现了成员的自我表现与自我服务,以主动展示文化的表现者身份,在自我塑造与欣赏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再者,在乐班的管理中亦能体现美好的、淳朴乡风,在王寿牌子锣乐班的班规中有约:“传承老师应以德施教,学生应做到互相尊重;互教互学,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做到德艺双馨”;“乐手在打锣时不准吸烟,遇白喜事即使主人讲礼摆出了凳子也不能坐,一律站着演奏以示对亡人的尊重”。³向外,作为扎根乡土的民间乐班,对乡风民俗存在天然的认同感,作为乡土文化的创造者和服务者,将这种认同感通过艺术创作与表演传递出去、感染他人,潜移默化地对塑造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信友善、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与价值观产生导向作用。

(三) 传承传统文化

民间乐班在我国的农耕文明的传承、创造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時代,民间乐班是传统的艺术、民俗、文学、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生力军。王寿牌子锣乐班的第五代传人王恒将一些斑驳破损的祖传曲谱加以整

理,编订成新的《王氏锣谱》,其中分锣鼓经与吹奏曲牌。分别为:锣鼓经单竿十三调;锣鼓经双竿二十二调;吹奏大乐三十九调。吹奏小乐四调。《王氏锣谱》不是孤本或绝本,录入的所有曲目都是乐班能熟练演奏的,是传统非遗活态传承的典范。相较于非遗时代之前的民间乐班,在媒体新时代,民间乐班更注重总结记载与实时记录,这些也是民俗仪程、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

四、总结

鄂东南民间乐班历经百余年的传承,经历了成形生长、衰落裂变、振兴发展的成长,随着社会的变迁进行着自适应的发展。在国家大力倡导乡村振兴的现今,面对日益多样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民间乐班所奏响的本土乡音依然成为民俗仪程的首要选择,也依然是多数乡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乐班发展动力的驱策下,在守正创新的传承机制中,鄂东南民间乐班在乡间沃土中蓬勃生长,迎着丰富乡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乡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使命,借助民俗活动、非遗展演弘扬传统文化,为乡村文化注入活力,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上).北京: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4 年版.
 - [2]蔡际洲,许璐.鄂州牌子锣调查报告.黄钟.2004 年第 4 期.
 - [3]许璐.鄂州牌子锣研究[J].武汉:武汉音乐学院.2009.
 - [4]冯君.王寿牌子锣乐班研究[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鄂东南民间乐班研究》;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1Q151)
- 1.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4 年,P488
 - 2.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4 年,P489
 - 3.王寿牌子锣制度[Z] 王寿牌子锣传习所.